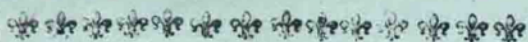


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教研室翻印

一九八〇年元月二日



目 录

一、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八月)

二、往事回忆

注： 这二篇资料，在个别标点和文字上可能有错，因此仅供教学参考用。引用时请找原文核对。

目 录

一、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八月)

二、往事回忆

注： 这二篇资料，在个别标点和文字上可能有错，因此仅供教学参考用。引用时请找原文核对。

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摘要)

我首先检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理介，不理介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特别不理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加上我从旧军队带来了浓厚的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军队作战主要是攻打城市，这就显然没有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人民战争的特点，也没有了解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相结合的汗力，因此也就不能了解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沈击战争可以逐步壮大革命军队，取得最后胜利。也就是不认真的依靠 人民群众。因此很容易的接受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立三路线时期，我执行了错误的立三路线。原来红五军军委在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的影响下，曾在一九二九年冬向中央提出过在沅阜山区（即湘鄂干边区）开辟根据地的建议，但是受到了当时中央的批评，不仅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轻易地抛弃了正确路线，毫无抵抗的接受了错误路线。又看到军阀混战，敌人后方空虚，给攻打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三军团前委就决定先攻占鄂南数县和湖南的临湘，岳阳等城。后来又在粉碎何健部队对平江的进攻以后，在追攻中占长沙。这次战斗在军事上虽然是个胜利，但是在政治上是个错误，不仅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扩大和巩固苏区，而且过早暴露了红军的力舅，引起了军阀对红军的极大注意，促成军阀战争的订止，並加紧对红军的进攻，一、三军团汇合成一方面军以后，在袁州会议上，三军团仍坚持要打

南昌。我这时没有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这次争执几乎造成一、三军团的分裂。在这件事情上，我当时不顾一、三军团的分裂，但对打南昌也抱有怀疑，对三军团内部团结也顾虑，又没有理由说服别人，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当时我表现得摇摆不定。在一军团打下吉安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三军团渡过于江，避免了一、三军团的分裂。

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执行了攻打干州的错误决定，结果伤亡很大，攻城未克，又丧失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进攻的有利时机。这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路线错误，干州战役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汉口会议上，提出了向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我对这个方针仍然不理睬，表示反对，同意了中央局一些同志错误的意见，特别错误的是同毛泽东同志争吵，态度很不好，并从此种下了对毛泽东同志极端错误的个人成见。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所理解的很迟。抗日开始后，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力量 and 进步性估计过高，没有真正理解只有发动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正确路线和纲领发生抵触，贯彻不力。首先表现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军分会的决议上，提出了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违背的错误的作战方针，其次当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纲领提出时，我又接受了这个错误的纲领，并在一九三八年春，在临汾作了传达，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下，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这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太行地区的群众运动，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执行得不好，从反右到反“左”，三起三落，其中我是应负主要责任的。但我并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一九四〇年的百团大战，在组织上说来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很显然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后，我没有认真组织讨论，而是错误的宣传了法国卢梭的全民政治——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模糊了阶级观点，混乱思想战线的又一表现。

.....

往事回忆

彭德怀

(一)

一、共产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一八九八年，我出生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里。幼年时因母亡父产，家中即破产变成了赤贫户。我小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因家庭贫困，便给人家当了两年放牛娃。十三、四岁又在瓦窑上做了两年工，以后回到家中耕地。

一九一二年，当地农业欠收，再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多数农民发生饥谨。由于穷人们不甘心饿死，自发地闹灾吃大户。我当时是倡导者之一。后来，此事被地主告发，加罪为聚众闹灾，扰乱治安，因此我便逃到洞庭西林围一带，当了两年多挑土工人。由个我饱尝了地主老财们的压榨，深知农民痛苦，我有一个伯祖父（名五十老信，参加过太平天国洪秀全部）经常给我讲太平天

国的故事。所以，我当时便产生了打灾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寻找出路的思想。于是，在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我便由担土工人投入湘军当兵，参加了驱逐汤都督（即汤乡铭）之役。

一九一九年，我在湘军任排长——连长职务。由于当时我对洋人在中国横行不满，再加上原有打灾济贫的思想，所以在部队中便开始了秘密活动。我们组织了“救贫会”会员都是穷人出身的士兵。此会的口号是，灭洋人收回海关、租界；灭老财救济穷人；反对克扣军饷。这个秘密组织，得到了所部较多的士兵拥护，而发展到七人，并没有委员会为核心领导。一九二〇年冬我驻防南县滋口时，为了减少当地农民的痛苦，经委员会讨论，派人秘密杀了恶坝地主欧某（其兄在赵恒惕处当少将高级参议）。事至一九二一年秋被告发，我弃职汗逃。

我原名彭得华，一九二三年，改名为彭德怀，投考了湖南军官讲武堂。但仍与原部队中的救贫会保持联系，负责主持委员会的是王绍南，张荣生二人，负责同我取得联系的是李灿（后来是红八军军长，一九三〇年负伤至上海医治被蒋介石杀害）。

一九二四年秋，我由讲武堂毕业，仍回第六团任连长，不久即任营长，部队中救贫会的秘密组织仍然保存，并且仍在起作用，其纲领已发展为六条：（一）反对列强干涉和瓜分中国，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二）罢工、罢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三）军队官兵有讨论国事自由，禁止军官对士兵笞责，罚跪，（四）打倒为灾不仁的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五）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六）提倡科学教育，废除么熟。以上这些条文，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军队中是有其进步意义和起了一定作用的。

一九二六年秋，参加北伐军围攻武昌时，王绍南等三名会员英勇牺牲。但是，我最幸运的是认识了段德昌同志，当时部队改为独立第一师，段为师政治部秘书长，我为代团长仍兼第一营长。这时，段对我的思想帮助是很大的。他经常送给我一些进步刊物，特别是共产主义ABC，阅读后印象较深。他多次给我介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段的这些革命思想，对于我的思想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而又通过我向秘密的士兵组织进行教育。从而，我知道他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向他提出了入党要求，他允为介绍人，但为了避免影响国共关系，党组织决定在第八集团军中暂不发展党员，因此，我的入党要求也就没有得到批准。当时我想，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努力工作，争取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普通战士。

一九二七年元旦，在一营部（壹昌）召开了救贫会员大会（当时会员已发展为十七人）。大家认为救贫会应作为核心领导（秘密组织），在士兵中广泛组织士兵会，并争取合法。士兵会章程有五条：

（一）士兵出身于工人、农民阶级，吃饭穿衣都是工人、农民生产出来的，我们要为工、农服务；

（二）拥护孙总理遗嘱，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和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

（三）既是国民革命军，就要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官打骂士兵，禁止体罚，反对扣军饷，实行经济公开；

（四）士兵有革命言论、集会自由，有阅读进步书报自由，

连士兵委员会由士兵自由选举组成之，再由连士兵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自由选举营士兵委员会，自觉地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实行士兵自治；

(五)士兵委员会，有监督，逮捕反革命分子解送军事法庭审判权，并有陪审权（此条有的人主张删去，但多数人同意保留，即保留了）。

在讨论这个章程时，大家认为是含有拥护共产党的进步因素的，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为工、农服务。但表示拥护孙总理遗嘱使国民党也抓不了辫子。为了巩固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第一营救贫会的秘密组织和广泛地组织士兵会，提出了这样的章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得到士兵拥护的。所以仅经过十余天的准备时间，便在全营广泛的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时期，起到了巩固部队，提高士气，参加革命的进步作用。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以后，大量的共产党人被杀害，进步的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遭到了反动势力的严重摧残，而造成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当年秋独立第一师由皖北绕经汉阳、沔阳退回湖南南县时，召开了营士兵委员会，大家共同分析了当时形势，找出了奋斗目标，并决定公开取消士兵委员会的名义，而保持其秘密组织和活动。大家认为，当时主要是应该保存实力，注意在其他营团中进行革命的秘密活动，以便扩展革命力量；对地方上由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沔乡委员会要给予抵抗，不能使其兴妖作怪。会后得悉，南县的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沔乡委员会。我们便派人于九日晚在县城散发大量传单，其内容：打倒土豪劣绅！枪毙沔乡委员会的成员！工、农、兵、学团结起来打倒新军阀！……等。第二天早起，城乡满布革命传

单标语。土豪劣绅纳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算有逃往长沙者，而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变为泡影。

在这以后，有几个月南县没有人敢出来再搞沅乡委员会的组织，从而保护了南、华、安党的特委和南县县委的存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了段德昌同志（他当时因秋收暴动负伤，隐藏在家，同南、华、安特委有联系），并且同他讨论了蒋介石的反动性，也讨论了戴季陶、孙科等等反动集团的行为；他谈论了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兵和青年知识分子。段德昌同志又对我的坚持对敌斗争的立场加以鼓励，他说我那种对敌斗争的决心很好，但是要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一定不要暴露自己，扩张力量，争取能逐步掌握到一个师的力量，伺机起义，对革命将会起到很大作用，他又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失败了，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但是，他是杀不尽的。这些勇敢的人们，必然要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进行不屈的斗争。段继续说，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要准备长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也要准备最大限度的耐劳耐怨。段德昌同志的这些话，给我指出了正确的为劳苦人民谋福利的斗争方向，也给了我无穷的力，并使我对革命增加了很大的信心。当时段德昌同志参加秋收暴动负了伤。他对我说，要经常同特委取得联系，要紧紧依靠党，这样自卫的斗争才不是孤立的。我说我仍希望加入共产党，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他又送给了我两本书，一是通俗资本论（这本书一直保存到长征结束的，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被参谋沅理文件烧了，十分痛惜）另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黄昏，党的南华安特委书记张匡（代

名)同志来到我处说,段德昌同志为我的介绍人,特委已经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只等省委批准。我当时对党给予我莫大的信任感到荣幸,但我对段德昌同志负伤感到不安。我说,最好使段德昌同志改为姓章,住到李灿家里(二连长)让我团伍军医给他治疗。伤可能会好得快些。张匡同志答应了。他又介绍了一个叫邓萍同志的人,要我在部队中给他安插一个位置,我答应了。他又了解了一下部队的力量情况,我都一一介绍一遍。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鉴于奋斗目标的一致,便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后来派张荣生同志送他到郊外。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张荣生同志口头告诉我说,特委已经接到省委回信,批准了我为正式党员。并问我何时方便,举行入党仪式。我说元旦黄昏后,到我团部办公室,那里比较秘密。届时张匡、邓萍、张荣生(都是党员)三同志来到我处,即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我宣誓:“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准备牺牲一切,甚至必要时献出生命,永不叛党”。从此,我有了政治生命,有了党的领导,也有了远大的理想。从而也走入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康庄大道。

二、平江起义的经过

一九二八年元旦我入党以后,李灿同志也相继入党,后来特委又派来一个交通李光同志,再加上邓萍、张荣生二人,我们五个党员便成立了一个支部。原来的士兵委员会,也就有了党支部为核心领导(不再是救贫会来领导)。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已经取得了政权,同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产生了新旧军阀的矛盾。保定系和士官系军阀为本身利害,

对黄埔军校系军阀有严重不满和恐惧情绪。支部会议研究了当时这些具体情形，准备扩属部队中的革命力量。所以拟在本团办一个学兵连，专门轮训班长和上等兵，以便培养新生力量。在筹办学兵连的工作时，在谈话中我发现周磐（师长）对南京政府和湖南当局也有不满情绪，我便趁机建议由师办一个随营学校，轮训班长，六个月为一期，周同意了我的意见。他说没有适当的人才。我说，黄公略是你保送黄埔高级班的，看来他担任此职极当。周即托我写信给黄公略同志回来筹办随校工作。

公略是一个求知欲很高的好同志，我们一九一九年即认识了，以后他在湖南讲武堂学习，彼此非常了解。毕业后，他回独立一师三团到济仁部下当排长，后在北伐时期当连长，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周磐保送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他在广州暴动（起义）后，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时值三月天气，公略同志由黄埔军校毕业来到了我团部，老朋友久别重逢，实有说不出来的欢欣之情。和他同来的有黄统一共产党员，贺国中（对革命事业非常热诚）二人，公略同志托我和周磐商量一下，争取录用统一、国中二人。以后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也就把我团的党组织情况和士兵会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工作任务和已经取得的工作成绩等，一一作了介绍，我说，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第一团只有第一营有党的组织，第二、第三营现在才准备发展；第二、第三团，最好通过随营学校发展士兵会，再进行发展党员，争取在两年的时间内做到全师多数连有党员，各连都有士兵会员。当时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具体工作，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分头去进行。

三月中旬，周磐由长沙回到南县主持随营学校开学典礼。戎

立三个学生大队，任命黄石（公略）为校长，黄纯一为教育长，贺国中为队长。四月中旬，独立一师奉命开驻平江接替阎仲伙旅防务。第一团驻平江城内，其中第二营驻在城南约五十里之思顺；师随营学校开驻岳州（岳阳）；第二、三团的驻在北乡虹桥和长寿两个地区。后来在六月下旬，黄公略同志由随校校长调任第三团三营营长职务。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据我士兵会员陈玉成（给周磐当马弁目，是我们的秘密情报工作者）由长沙来密电称：南华安特委被破获，黄石在南县写给特委的通行证也被搜获，周磐认出是黄石的亲笔迹，黄被供认是共产党员，周已电李想根（付师长）逮捕黄石、黄纯一、贺国中三人。再者由于我同平江电报局有联系，故周给李之电报被我收到了，根据两方面的可靠情报看来，情况实属严重，我便即刻召开了团委紧急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决定起义，并且制定了起义计划和步骤。湖南省特派员滕代远同志恰于此时到达平江，参加了会议，他对于起义的政治准备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即按照计划开始了各方面的布置。可是在二十日夜半，第三团长到济仁来电话，说黄石于当日黄昏时杀死其侄第十连长，领导全营闹饷哗变，逃往南山（浏、平交界处）。从则来电话得知，黄公略同志未按计划先行起义。我们又立刻召开了团委会议，大家认为一定要有一定的起义准备工作，所以仍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午，正式宣布起义。首先利用午睡的时间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民团，警宪及师的直属队，共约二千余人，在平江城内首先胜利。至二十二日午后驻离城五十里的第二营也应调按时开回平江城。二十二日午后，随营学校由岳阳也

按时开到平江。黄公略同志领导起义的那一营，当开至离平江城五里处休息时，黄即离开部队亲自来城内商讨以后的工作布置，刚到不久，即得悉该营在九连长贺仲斌的煽动下背叛了起义向南逃窜。公略同志去该营任职为时不足一个月，此种事变之事不算特别意外，惟不按起义预定时间，起义后又不设法通知，在南县写给特委的通行的浅露秘密，这些是他的错误。如不采取机断处置，当时可能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便在本团及随营学校中，进一步的发动了士兵群众，充分发挥了士兵会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洗反动军官的工作，把多年以来积蓄下来的公积金（在平江也筹了一点现金），每人发了十二元银洋（三千七百余人），给旧军官发经费遣送出坪，从而提高了士气，保障领导机构的纯洁，巩固了起义部队。二十二日，平江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下编为一、四、七团，每团约千人。雷振斌任第一团团长（后叛变），李灿为党代表；陈鹏飞为第四团团长，黄公略（石）为党代表，黄纯一为七团团长兼党代表，贺国中同志为时团长。黄连长以及其他各级干部，也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巩固了部队，提高了士气，从而保证了平江起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党领导下的士兵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也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得到了广大士兵群众和当地人民的拥护。不然，这次起义是胜利不了的。

但是，虽然取得了胜利，在军事上犯了一次错误。本应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把部队撤离平江县城，东进至江西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没有这样作，而错误的想通过击败敌人的进攻来提高士气和树立部队的声威。结果适得其反。

七月三十日敌人分五路约七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城进攻，我第一团在城郊与敌军激战终日；我七团企图协同第四团从敌侧的歼灭敌人一部，而四团未经请示深入浏阳（遭敌袭击，损失人员过半），因而失去联络，兵力的散。结果，因敌众我寡未达目的，伤亡约二百多人。黄纯一同志在此役中光荣的牺牲了！至黄昏后才安全拗出平江城。这是我参加红军的第一次犯的错误。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呢？现在检讨起来，主要是当时只有盲目的革命热情，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方针，不晓得中国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沈击战争，广泛地发动群众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孤立城市，积蓄自己革命力量，最后才能取得城市。对于毛泽东同志这种英明的正确的军事思想，我当时是非常模糊的。这是那次错误的的关键所在。

三、第二次红四、五两军会师宁冈

一九二八年八月初，红军第五军离开平江进占了江西之修水铜鼓。湘、赣、鄂三省反动军队又集中了十余团向我军举行“会剿”。经过两个多月的打圈子战术（敌称之为盘旋战术），才把敌人拖疲击退。在铜鼓之幽居，以滕代远、王首道同志为首的领导下，召开了湘、鄂、赣三省边区县委联席会议，成立了边区党的特委，王首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这次会议，总结了平江起义取得胜利的几条经验。第一，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组织和计划；第二，是由于有湘、鄂、赣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忱支援；第三，特别是井冈山革命旗帜作为榜样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指引——这不是偶然的，是在北伐战争失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井冈山起

了收容阵地和继续指导全国武装斗争的作用；总结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运动的丰富经验，而成为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旗帜；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这次会议也反对了乱烧乱杀的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会议决定：将红五军所部同地方沈击队混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军属特务大队。一纵队和平江地区；二纵队在浏阳、万载；三纵队在铜鼓、修水坚持沈击战争。黄公略任第二纵队队长，并临时指挥其他各部。我和代远同志带五个大队，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十一月初同红四军在宁冈会师了。到达宁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详细讨论了“六大”决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毛泽东同志的阐述，使我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也是毛泽东思想初次对我们传轨，因此到现在尚记忆犹新。

在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向井冈山“会剿”形势已经形成，我红四军物质又极为困难（油、盐、药物、特别尽衣），红四军只有离开井冈山向外地发展，否则没有其他较好办法克服困难和搞乱敌人的“会剿”部署。可是，部队伤扩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无法安置。派部队留守，就势必分散主力（当时红四军大约四千余人），不利于主力行动和作战。如不留守，对坚持湘赣边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也是不利的。以一部分兵力防守井冈山，就可以吸引住敌人“会剿”的主力，对于当时红四军向赣南行动是有利的。红四军前委根据当时情况正确地决定，将红五军部分留守井冈山，并编入红四军，我为付军长，坚守井冈山根据地。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在红五军军委讨论时，意见是不一致的，多数同志是不同意五军留守井冈山。他们的理由是：